



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

本书以考古发现的楚墓资料为基础,结合出土简牍及礼制文献的记载,来探讨楚国青铜礼器的使用制度问题。从用鼎制度、漆盛器制度、酒器制度、盥洗器制度等方面来梳理楚国青铜礼制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进而揭示出楚国的礼制改革之路。再通过文化的比较分析方法,来探讨楚地与中原、关中、齐鲁等地区礼器制度的异同,从器用制度的角度来认识礼制文献的创作时间、地域等相关问题。

张闻捷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本书由厦门大学社科繁荣计划项目“中国历史的南方道路”资助出版



“人群·国家·社会”研究书系

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

张闻捷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张闻捷著.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 6

(“人群·国家·社会”研究书系)

ISBN 978-7-5615-5597-2

I. ①楚… II. ①张…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中国-楚国(? ~前 223)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6328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 361008)

总编办电话: 0592-2182177 传真: 0592-2181253

营销中心电话: 0592-2184458 传真: 0592-2181365

网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 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6 插页: 1

字数: 506 千字

定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张闻捷于2006年9月由武汉大学保送到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两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转为直读博士生,2012年7月取得博士学位毕业。现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任教。在读研究生期间,由我担任导师进行指导,与其商定重点研究东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制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东周青铜礼器制度研究》,此次出版的《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一书,是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进行了扩充、修订而成。

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途径看,是以一种独特的礼制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尤其是青铜时代的夏商周三代是一种礼制性的社会,礼制既是生活习俗,又是思想信仰,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制度,三代的统治者正是凭借礼制来保证等级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成了治国安民之根本,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礼仪制度与礼制文明之模式。作为这一社会秩序和制度的物化形式——青铜礼器也就出现了。因此,青铜礼器则包含着政治内涵,思想内涵及等级观念、等级制度之内涵,成了政权的象征,等级关系的标志。“礼制”即“以礼来治”,成为各地域政治、思想、文化等由多元走向一统的最有效的促动力,从而构成了三代时期统一的礼制文化共同体。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江汉地区的青铜礼制文化是在商周礼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江汉地区发现的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是商王朝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政治军事据点,商代青铜礼制文化正是通过这个据点向长江中游推进的,向南一直影响到湖南、江西等区域,在湖南的宁乡、湘潭、湘乡等地,以及江西的新干等都曾出土大批青铜礼器。商系青铜礼制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域的强烈反应,这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播,而且也是思想观念上的传播,以此来代表权力,代表尊贵,代表等级制度及思想信仰。长江中

游地区商时期的各部族或政治集团,正是借用商王朝的礼制文化、礼制观念、礼仪制度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周人以小国灭掉大国商,不可能全部都实行直接统治,因而采取了封邦建国的历史性措施,即把自己同宗的血亲和姻亲等分封到各地进行统治,“以藩屏周”,对异姓部族也进行了分封,纳入到周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西周王朝通过分封对“南国”进行紧密控制,也就将周系统的青铜礼制文化传播到江汉地区,由原来商文化大系下的青铜文化类型,逐渐转变为周文化大系下的青铜文化类型;由商王朝以青铜爵、斚、觚等酒礼器数量定身份等级的制度,转变为周王朝以鼎、簋等青铜礼器数量定身份等级的制度,周系青铜礼制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楚国青铜礼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基于上述的认知,张闻捷将楚国青铜礼器放置在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大系之中进行考察。其反复研读了《周礼》、《仪礼》、《礼记》等大量文献,奠定了研究礼制的文献基础;搜集了大批东周各国所出土的青铜礼器资料进行比较,拓宽了研究的视野;阅读了大量有关礼制研究的著作,加深了研究的深度;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访学一年,借鉴了许多西方学者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张闻捷在这样的基础上对楚国青铜礼器制度进行研究。不仅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运用社会学及思想史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其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楚国青铜礼器的类别、组合、形制及属性等分门别类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了各类礼器的变化规律,以及各地域礼器制度之异同,分析了所包含的各种文化因素等。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探讨了楚国“礼制改革”途径及动因,并深入探讨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问题。从而将考古学物质文化研究的层面上升到研究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高度。此正是这部著作的独到之处。

此著作对楚国的“用鼎制度”、“漆盛器制度”、“酒器制度”和“盥洗器制度”进行了细致研究,提出了较多新的、重要的学术见解。楚国的用鼎制度是众多学者注重研究的,已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张闻捷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认为楚国的用鼎制度至少有三个核心特征:偶鼎制度;祭器与食器制度;今、古式礼器组合制度。这些新用鼎制度的出现,与楚国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文中指出,随着楚国贵族群体的增长,社会等级体系的扩张,促使用鼎制度的复杂化、专门

化、世俗化,也反映出楚国的生死观念、“文”与“质”思想信仰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变化。在“采盛器制度”研究部分,重点研究了簠、簋、敦等使用制度的变化,探讨了这些采盛器是如何与诸种鼎进行搭配的,并随着用鼎制度的变化是如何调整的。经研究发现,簠、簋、敦三者自纳入楚人礼制系统中后,就一直遵循着共存的关系,而未见中原等地所出现的礼器组合的更替。并发现,鼎、簠的组合主要局限于高等级贵族使用,反映出楚国社会上层在礼制上更具尊古、守旧倾向,这与楚人用鼎制度中的“今、古式组合”正相吻合。另外,还对楚国漆豆的使用制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亦遵循一套较为独特而有序的称名和器用制度,正如《三礼》所记载的是作为庶羞之盛来使用的,并无中原等地出现在礼制功能上取代采盛器的用意。在“盛酒器制度”研究部分,梳理出了三个等级的盛酒器制度:中高级贵族墓多随葬2方壶、2尊缶、2圆壶;小贵族墓多用2尊缶、2圆壶;身份再低者则只用2尊缶或2圆壶。从形态上看,楚式方壶是由周式方壶发展而来,中高级贵族墓随葬方壶,也应属于尊古、复古的范畴。在“盥洗器制度”部分,论证了楚地盛行的盘、匜、盥缶、鉴、小口鼎五类盥洗器的礼制功能及变化,发现楚国的盥洗制度与《仪礼》记载的周制有所不同。

“青铜礼器组合变化与礼制革新”部分,是综合前部的研究成果,从器用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楚国礼制革新之途径。张闻捷详细地梳理了楚墓随葬礼器组合的变化及所对应的墓主等级情况,探讨了楚国礼制改革的动因。认为,东周时期楚国贵族群体的扩张,进而带来社会等级结构的调整,是导致楚国礼制复杂化进程的根本原因。从而将楚墓中礼器类型、组合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等级分化等紧密联系起来。张闻捷进一步认为,引起东周时期列国青铜礼器制度改革的原因不仅仅是基于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化,周人(包括楚人)对于已逝祖先的看法(死后的状态)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青铜礼器的功能如何多样化,宗庙祭祀是维系生人与祖先的联系仍是其最核心的内涵,亦是“钟鼎彝器”盛行于三代的思想基础。而墓葬是连接生与死的物质载体,更能直接反映出社会各个阶层生死观念的变化。由此,著作中设置《周代贵族生死观念的变迁》一章,通过对墓葬的布局、结构、随葬品组成的细致分析,结合文献记载,阐述了周代生死观念的变化。认为,两周时期生死观变迁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对死者死后存在方式认知的转移:

西周时期,丧葬与祭祀活动均以祈求成为神祇的祖先降福为核心目的;至春秋以后,魂与魄对立的观念开始形成,贵族们逐渐意识到死后世界的存在,以及祖先在地下的各种需求,于是,有别于祭器而专致于鬼神的明器开始大量出现;战国之后,天上之神与地下之鬼的对立观念更加得到强化,为了使死者能够如生时一样的生活,于是,墓祭开始流行,田宅美食得以在墓中出现,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的选择也都以“事死如生”的原则进行。当然,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但毕竟是通过墓葬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实际现象,深入探讨了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的个案研究》、《楚国青铜礼器的称名制度》两章以及四个附录,均是围绕上述的研究宗旨,由考古实物资料具体而微地研究楚国的礼仪制度的,都有许多新的学术见解。

总的来看,张闻捷利用考古资料对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研究,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脉络和框架体系。此著作奉献给学术界,还望学术界的同仁们斧正,帮助年轻学者继续努力,以期有更多的力作问世。

高崇文

2015年4月

目 录

001 第一章 楚国青铜礼器的发现与研究

003 第一节 楚系青铜礼器的发现与研究简史

011 第二节 楚国典型铜器群的年代序列

018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021 第四节 相关问题说明

022 第二章 楚国的用鼎制度

022 第一节 楚国用鼎制度研究回顾

028 第二节 楚国铜鼎的分类与功能

036 第三节 楚国用鼎制度的变化与社会等级结构的异动

054 第四节 楚国用鼎制度的核心特征

069 小 结

071 第三章 楚国的漆盛器制度

071 第一节 楚国漆盛器制度研究回顾

077 第二节 楚国青铜簋、簠的使用制度

089 第三节 楚国铜敦的使用制度

105 第四节 楚国漆豆的使用制度

111 小 结

114 第四章 楚国的盛酒器制度

115 第一节 楚国盛酒器的分类与功能

121	第二节	楚国盛酒器制度的演变
126	第三节	与中原地区盛酒器制度的比较
131	第四节	礼制文献中的盛酒器制度
134	小 结	
137	第五章	楚国的盥洗器制度
137	第一节	楚国盥洗器的分类别与功能
141	第二节	楚国盥洗器制度的演变
147	第三节	礼制文献中的盥洗之器
150	小 结	
152	第六章	青铜器组合变化与楚国的礼制革新
154	第一节	楚国的三类礼器组合
164	第二节	楚国礼器组合的发展变迁
168	第三节	楚国礼制革新的动因
175	小 结	
176	第七章	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的地域差别
177	第一节	楚墓分区研究回顾
179	第二节	楚墓中的第四套葬器组合
185	第三节	江陵地区的葬器制度
190	第四节	楚国北部地区的葬器制度
196	第五节	楚国南部地区的葬器制度
200	第六节	楚国东部地区的葬器制度
206	第七节	鄂东地区的葬器制度
207	小 结	
210	第八章	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的个案研究
210	第一节	寿县李三孤堆大墓的青铜礼器制度

- 224 第二节 枣阳九连墩楚墓的青铜礼器制度
- 238 第三节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的青铜礼器制度
- 252 第四节 蚌埠钟离君柏墓的青铜礼器制度
- 265 小 结

266 第九章 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的渊源探索

- 267 第一节 汉水北部地区的青铜礼器制度
- 274 第二节 淮水流域的青铜礼器制度
- 280 小 结

282 第十章 楚国青铜礼器的称名制度

- 284 第一节 飨器组铜器
- 292 第二节 行钟与行器
- 303 小 结

306 第十一章 周代贵族生死观念的变迁

- 308 第一节 西周时期的生死观念
- 310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生死观念
- 319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生死观念
- 327 小 结

329 结 语

- 333 附录一 漆画中的楚国婚礼
- 348 附录二 遣策中的楚国服饰之礼
- 357 附录三 墓葬考古所见楚汉丧葬礼俗的传承
- 375 附录四 周代祭祀仪式的变革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用鼎谈起
- 384 参考文献

第一章

楚国青铜礼器的发现与研究

771BC,在曾、申等国的策应下,犬戎攻破周都镐京,幽王被杀,曾经烜赫一时的西周王朝灭亡。翌年,由于犬戎的压力以及王室破败,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阳^①,史称“平王东迁”^②,自此“东周时代”(770BC—221BC)开始^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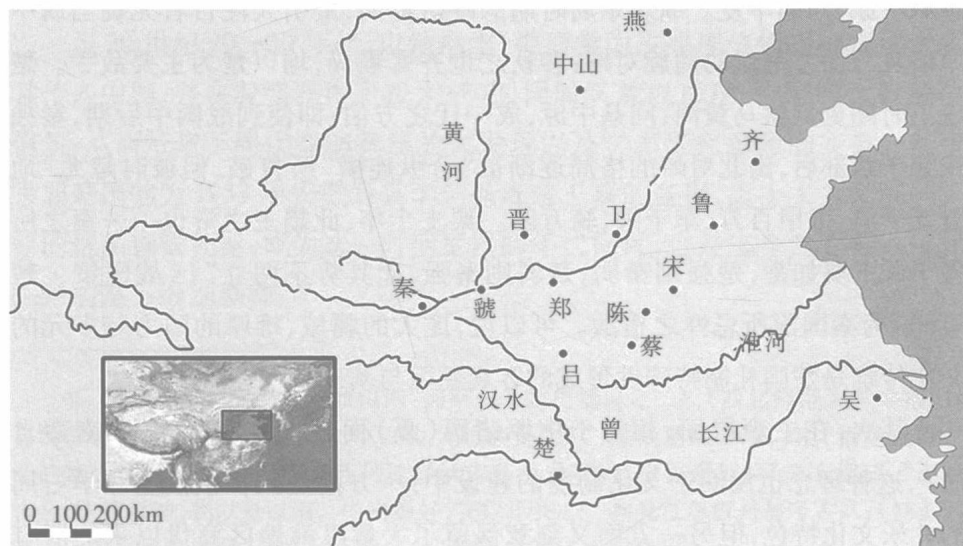


图 1-1 东周时期主要诸侯国地理位置示意图

① 关于周平王迁都洛阳的原因,史学界尚存在众多争议,此处取《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之说:“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

② 关于平王东迁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可参看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汤惠生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③ 严格来讲,东周政权于256BC为秦所灭,而战国之世则终于221BC秦统一六国,其间尚有若干年差距。不过本文为论述之便,将“东周时代”笼统视作“春秋”(770BC—453BC)与“战国”(453BC—221BC)的集合体。

东周时期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由于中央王庭势力衰微,其对地方诸侯们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控制,先后崛起的郑、齐、晋、秦、楚、吴、越等强国为争夺霸权、土地、人口、财富等而割据一方,彼此互相征伐(图1-1)。《史记·周本纪》曾书云:“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而随着地方政治、文化自主性的增强,原先由周王室所主导的、统一的礼乐制度也逐渐演化为各地新兴的、各具特色的礼乐文明,此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论语·季氏》)。

而南方的楚国即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新的区域性礼制中心所在。根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楚人受封于西周成王时期,初时“土不过同”,此后逐渐兼并汉水、淮水流域众多国家,成为周代南方的霸主,并锐意进取中原,问鼎华夏。纵观东周时期的政治格局,最引人注目者无疑当属中原诸夏与南方楚蛮的周旋对峙:春秋之世齐晋霸局,均以楚为主要敌手。楚庄王时期更是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成一代之方伯;即使到战国中后期,秦独崛起于西部后,南北对峙的格局逐渐被“合纵连横”所打破,但彼时楚尤“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为秦国深所忌惮之宿敌。可以说,庞大的疆域、雄厚的国力与多元的文化传统是楚国礼制特殊性形成的客观原因与基础。

其次,在主观层面,相对于中原诸国(夏)而言,楚人又常常以南蛮自居^①,这种理念也浸润于文化制度的建设中:一方面楚人积极借鉴和学习周的礼乐文化特色,但另一方面又刻意保留了大量汉淮地区商代以来的旧有礼俗,从而造就了其礼乐文明的独特性。正如《诗·小雅·鼓钟》“以雅以

^① 如《史记·楚世家》:“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等。

南”,毛传云:“南,南夷之乐曰南。”^①《礼记·文王世子》“胥鼓南”,郑玄注:“南,南夷之乐也”,便足以表明当时在乐制上南北两方存在着显著的不同。有鉴于此,我们便尝试从青铜礼器使用的角度,来全面考察楚国礼制的特点及其与周制的关系。

第一节 楚系青铜礼器的发现与研究简史

楚国青铜礼器的发现最早可追溯至汉代永平年间^②,此后在宋、清时代的金石学著作中也偶有收录,对此刘彬徽先生已有很好的梳理结果^③,可兹参阅。

至20世纪20—30年代,以地层学、类型学为主要理论依据的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并在殷墟获得了极大成功,同时又兼以京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修筑,从而带来了周代青铜彝器的大发现以及学术研究思想的变革。其中隶属楚国的为1933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的盗掘,出土了大批战国末年的楚系青铜礼器,成为这一时期楚器的年代标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供探讨的楚王级别墓葬。^④

① 张平辙:《〈诗经〉“以雅以南”何解——古史新说之二》,《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文中以为“雅”当是“夏”,是诸夏的音乐,“南”借指荆舒地区的楚、徐国南音。1983年江苏丹徒春秋古墓中发现的“徐器遘邠钟”亦有铭曰:“允唯吉金,作铸觶钟,我以夏以南。中鸣媿好,我以乐我心。”参见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

② 《史记·楚世家》集解引《皇览》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淝阳县葛陂乡城东北,民谓之楚王岑。汉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于土中得铜鼎,而名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传言,秦、项、赤眉之时欲发之,辄颓坏填压,不得发也。”由于此后分章论述中亦会简要谈及相关铜器类别的研究简史,故这里仅列举代表性的考古发现与综合性研究成果。

③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④ 李景聃:《寿县楚墓调查报告》,傅斯年等编:《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朱拜石:《考订寿县出土古器物初稿》,1934年,现存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刘节编撰:《寿县出土楚器图释》,国立北平图书馆,1935年影印本;邓峙一:《李品仙盗掘楚王墓亲历记》,《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年;唐兰:《寿县出土铜器考略》,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四卷一期,1934年。

同时,这一时期关于两周青铜彝器的学术研究思想亦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对于此后楚文化的探讨同样是影响深远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王国维先生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的盛行(1925年),即将文献典籍记载与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相结合,从而摆脱了旧时金石学的传统考据方法的桎梏。如在其名作《说罍》、《说觥》、《说盃》诸文中,王氏利用端方所藏宝鸡出土铜禁上的商代酒器组合,论证了罍当为文献中的“散”、“盃”当是饮酒注水之器等,对于北宋以来相沿未改的青铜器定名问题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见解^①。

郭宝钧先生则将其在河南汲县山彪镇 M1 发掘中所接触到的“成组铜鼎大小依次递减排列”现象与文献中所提及周代贵族“列鼎而食”的记载相联系^②,首次从考古实物中确认了列鼎制度的存在,从而开启了关于鼎制研究的序幕。

其二是器物类型学研究理论的引入。李济先生早在1932年发表的《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一文中^③,对殷墟出土的矢、戈、矛、刀、有銎斧等分别做了形制的区分,排列其出现的早晚顺序,探讨了不同形制的演化规律。这一研究方法在其随后的《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1948年)^④、陈梦家先生的《中国青铜器的形制》(1945年)^⑤等文章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完善,从而为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手段。而其更重要的

① 俱收入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2006年。唐兰先生则主张礼经中“角”当是指今天所习称的“尊”,参见唐兰:《古代饮酒器五种——爵、觚、觶、角、散》,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7月30日。

②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1-12页。

③ 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收入《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

④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商务印务馆,1948年。文中对殷墟十座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容器,做了细致的目、式、型的区分,并依靠器物的逻辑演变顺序及形制数据关系排定了其年代顺序。

⑤ 陈梦家先生1945年《中国青铜器的形制》一文中对当时所见250余件铜卣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学分析,讨论其发展谱系与年代,开创了对单一铜器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先河。该文后载于陈氏:《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525-542页。

意义还在于,考古学研究开始摆脱“证经补史”(补充检验文献之不足)的限制,而逐渐具有了自身成熟的理论、方法体系。

其三则是开始关注青铜礼器的地域信息(出土地点),尤其是东周时期不同国家间青铜礼器的差别,这与上述郑、卫、魏、楚、东周等国家贵族墓葬的发现是密切相关的,更为此后的“文化因素分析法”奠定了基础。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郭沫若先生 1934 年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①,书中以铜器铭文资料为切入点,“西周系以年代,东周区以国别”,不仅对众多西周铜器的年代做出考证(“以铭辞史实自述其年代”,即标准器断代法),更是首次对东周铜器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书中共收录列国器铭 261 件,有图形可征者,除见于铭录外,计 118 件,他在对这些铭文进行详尽考证的基础上,确定其国别(共分 32 国),并指出了青铜器及铭文的地域特征,从而开创了东周铜器分区研究的先河。郭氏还进一步指出,两周时代青铜文化“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并且“徐楚乃南系之中心”,说明业已认识到楚系青铜器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可惜因材料所限,彼时尚不能对其做进一步的概括和区分。

新中国成立后至 80 年代,由于战乱的结束,青铜器的盗掘现象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一批保存完好、器类齐全的楚国贵族墓葬得以相继出土,从而为青铜礼器的组合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这一时期在南方先后发掘的代表性的东周墓葬包括:1951 年由夏鼐先生亲自主持的长沙近郊古墓的发掘,共整理墓葬 162 座,其中楚墓 73 座。^②随后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又在这一地区陆续发掘了大批楚墓^③,其中保存较好者如长沙仰天湖第二十五号木椁墓、长沙浏城桥一号楚墓、长沙子弹库一

① 该书初版于 1932 年 1 月在日本印行,手写影印,只有考释而没有图版。1934 年,郭氏汇集铭文及器形照片,编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共 5 册;次年又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共 3 册,均在日本出版,于是将初版作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作者对全书做了修改补充,抽换并增补了一部分材料,于 1957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统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共 8 册。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 年。

③ 可参见湖南省博物馆等编:《长沙楚墓》第一章《前言》,文物出版社,2000 年。

号楚墓^①等,正是基于这些楚墓中独特的丧葬习俗与随葬品,学界自此正式揭开了楚文化研究的序幕。1955年由于治淮工程而在安徽寿县西门发掘了春秋晚期的蔡侯墓,从而确立了春秋晚期晚段楚系铜器的标尺^②;1957—1958年发掘了信阳长台关M1、M2两座大型楚墓^③;60年代又在江陵发掘了望山沙冢楚墓群,从而基本了解了战国中后期楚国铜器的面貌^④。

在这些楚墓及其他东周贵族墓葬的发现基础上,60年代中期郭宝钧先生在其著作《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1965年初稿,定稿于1971年)一书中首次引入“标准铜器群”的概念,以铜器组合为切入点,将陕县上村岭器群作为春秋初期的铜器尺度、寿县蔡侯墓作为春秋晚期的铜器尺度、寿县朱家集和信阳长台关器群作为战国晚期的铜器尺度,再进而来排列其他相应铜器群的年代,进一步完善了殷周铜器的分期断代工作,并提出了商周之际“重酒组合”向“重食组合”转变的重要认识^⑤。尽管在当时受考古发现的局限,尚不能完全明晰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铜器间的异同,但其在研究方法上的开创意义仍影响深远。

80年代前后更多的相关考古发现也主要集中在南方楚文化区内,这对当时楚文化研究的兴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像1978—1979年发掘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⑥,1978年发掘的荆州天星观M1楚封君墓^⑦,1980年发

① 湖南省文管会:《长沙仰天湖第25号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子弹库楚墓》,《文物》1974年第2期。该墓出土有著名的人物御龙帛画和楚帛书。

② 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唐兰:《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序》,文物出版社,1958年,文中指出寿县蔡侯墓当为蔡昭侯申之墓,但墓中又有其父悼侯的遗物。1963年又在安徽淮南市蔡家岗发掘了蔡声侯产之墓,惜被盗掘严重,参见马道阔:《安徽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第4期;殷涤非:《寿县蔡侯墓铜器的再研究》,《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④ 湖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⑤ 郭宝钧著,邹衡、徐自强整理:《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⑥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⑦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掘的淅川下寺蔦氏家族墓地,为了解春秋时期的楚国铜器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①;1978年、1985年先后发掘的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②,1982年发掘的江陵马山一号墓,由于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品,对于了解楚国的丧葬礼俗和纺织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③;1984年发掘的当阳曹家岗五号楚墓^④,1986年发掘了荆门包山墓地,其中 M2 为楚国左尹邵佗之墓,属大夫等级,该墓不仅随葬品保存完整,更有大量法律文书、祭祀祈祷和遣策简出土,为深入了解楚国的葬器制度带来了全新的机遇^⑤;1981—1989年在江陵九店陆续发掘了近 600 座楚国中小型墓葬^⑥,再加上此前发掘的襄阳山湾墓地、江陵雨台山墓地和当阳赵家湖墓地等资料^⑦,基本解决了楚国春秋中期至战国以后的铜、陶器分类、分期问题^⑧。

以这些墓葬为支撑,学者们延续郭宝钧先生的“标准铜器群”分析方法,同时借鉴苏秉琦先生所提倡的“区系类型”研究思路,开始了对楚国青铜器分期断代的深入探讨,如高崇文先生《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⑨,刘彬徽先生

① 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② 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湖北省博物馆编著:《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随州市博物馆编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

③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关于葬具、饰物、纹衾的研究,可参看该报告第四部分,第96—100页。

④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⑤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荆门市包山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5期;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江陵九店东周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⑦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荆州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5期;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其中金家山 M9,赵巷 M4,赵家湾 M2、M3 等铜器墓对于了解春秋早期楚国的铜器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⑧ 此处未收录的其他楚国铜器墓葬可参看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以及本书所附参考文献。

⑨ 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